

北堂书史略*

(荷兰)惠泽霖^①著 (美)李国庆译注

译者说明:“北堂书”指的是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西什库教堂图书馆收藏的一批西文图书。这些书在历史上曾分属北京东、南、西、北四个教堂和外省教堂及个人。1949年,北堂图书馆馆长惠泽霖主编了一本《北堂书目》。这本书目分四个部分。“前言”介绍了目录编纂的缘起和经过,“北堂书史略”梳理了藏书的来源、聚散、流传和现状。再加正文和附录。这份“史略”无疑是我们研究北堂书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李保华先生1989年曾将其译出(底本不详),发表在《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2、3、4期上,嘉惠不识外文的学者,用意极好。可惜的是,译文中明显可商榷的地方不少,意义模糊不明或令人生疑的更多。后人转述,愈添困扰。今不揣冒昧,据英文重译并作注,以正本清源,并推动对北堂书的研究利用。这篇《史略》洋洋近三万字,所述皆为几百年前旧事,牵涉人众、事杂、文种多,因而翻译困难较多,不当之处或也不少,还望高明指教。

概论

北堂书是一份历史遗产,始于1583年9月10日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止于1773年耶稣会被取缔,在两个世纪内日积月累,聚散无常,历尽沧桑。

1785年,遣使会会士受教廷传信会和法国政府指派,前来接收法国传教团北堂。4月29日,他们抵达北京。5月6日,北京主教汤士选^②宣告接收了北堂的宗教和世俗财产。

为了避免误解,首先在此声明,当时遣使会士接收的法国耶稣会藏书,只是真正的北堂书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北堂书当时已经存在,但是还分散在中国各地。

* 本文为 *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北堂图书馆书目》) 的序言,该书目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① Hubert Germain Verhaeren, 荷兰人,一说比利时人,遣使会士。除此书目外,另撰有“王徵与所译《奇器图说》”(景明译),载《上智编译馆馆刊》第二卷(1947年)第一期。

② Alexander de Gouvea (1751-1808), 葡萄牙籍,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就任北京教区主教,1788年后任钦天监右监副,后转左监副,1806年始任监正。

遣使会士是在乾隆教难^①期间到达的,所有被拘押的传教士才刚刚被递解到北京。嘉庆进一步强化了他父亲的禁教措施。他确实在算学馆留下了三名传教士,但是再未递补,而算学馆也在1826年被撤销了^②。从1785年延续到1826年的这场教难,摧毁了传教士在中国的所有住堂,其藏书也就像沉船的残骸,漂泊到了南堂,因为北京的最后一位传教士毕学源^③作为北京教区的主教,又在那里苟延残喘了12年。去世之前,他把这批书交给了俄国东正教团代管。1860年英法联军进京后,俄国教团又将这些书归还给了首任代理主教孟振生^④大人。于是这些书就进了老北堂的所在地^⑤,形成了现有藏书的一部分。

北堂书可分为以下几类:

1. 北京四堂的全部遗存:属葡萄牙耶稣会的南堂^⑥和东堂^⑦,属法国耶稣会的北堂,属传信会的西堂^⑧。

2. 三家私人藏书:嘉乐^⑨主教(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的特使)藏书,耶稣会索智能^⑩主教藏书,圣芳济第三会汤士选主教藏书。

3. 内地传教团并入的十家小型藏书。

4. 姓名不详的传教士留下的和来源不明的藏书。

我将主要论述那些我能够凭借书籍本身提供的信息而确定出处的藏书。

①乾隆十一年(1746)五月,福建巡抚周学健奏请缉拿教士,清廷密令各省都抚查索,自此为始,各省教难大作。

②算学馆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始设于畅春园蒙养斋,专门为钦天监培养人才,教师由钦天监官吏承担,所学课程都是钦天监所用的专门学问。该算学馆一直存在到清末。

③Cajetanús Pires(1763-1838),葡萄牙籍遣使会会士,北京教区署理主教兼南京教区的主教,1823年钦天监监副,1826年任监正,1837告病辞职。从此钦天监不再用西洋人,西士任监正二百年,于是年结束。

④Joseph-Martial Mouly(1807-1868),法国人,1846年任北京教区代理,1856年任北京教区主教。

⑤在中南海的中海西边、紫光阁以西、羊房夹道(即养蜂夹道)以南名叫蚕池口的地方,相当今文津街国家图书馆斜对过。

⑥即宣武门天主堂,俗称南堂,位于北京西城区前门西大街141号,始建于1605年,现存的建筑建于1904年。

⑦即王府井天主堂,俗称东堂,又名圣若瑟堂、八面槽教堂,位于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74号,是耶稣会士在北京城区继宣武门天主堂之后兴建的第二所教堂。

⑧即圣母圣衣堂,俗称西堂,坐落在西直门内大街南侧,始建于1723年,时称七苦圣母堂。现在建筑为1912年重建,并更为今名。

⑨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1685-1741),亚历山大里亚城总主教,来华传达教皇教谕,并与康熙帝谈礼仪问题的特使。

⑩Policarpe de Souza(1697-1757),字睿公,葡萄牙人,1725年来中国,1740年12月17日任北京主教,1757年5月26日卒于北京。

我将探讨它们的来源、组成,以及最终进入北堂书的原因。结果一定很不完善,尤其是有关组成的情况。现存北堂书共 4101 种 5133 册,其中只有一半多一点,即 2855 册 2281 种略有迹可循:书主的印鉴或签名,给某个住堂、教团或图书馆的题识。其余的书要不一片空白,要不就是其捐献者或拥有者已无法查考了。

第一章 南堂藏书

葡萄牙南堂藏书历史最长最丰富。它由利玛窦神父及其同事所建立,在两个世纪中经由耶稣会神父的不断增添,从欧洲采购,以及施主的赠送而不断扩大。其中耶稣会士金尼阁神父从教皇保罗五世那里得到的那一部分最有价值。

第一节 基础:利玛窦藏书

利玛窦神父于 1601 年 1 月 24 日就到了北京,但不得不等了将近五年才买到一所房子,就是现在南堂所在的地方,时在 1605 年 8 月 27 日。所以我们可以将它作为藏书始建的日子。从利玛窦传道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信奉的是借士大夫来征服民众,又借欧洲科学来征服士大夫,因此书籍至关重要。他在书信中反复重申这种传道方式的特殊需要:科学家和书籍。尤其是数学、天文学、宇宙学和自然科学的书籍。欧洲对他似乎十分慷慨,因为他在 1605 年 5 月 5 日写道:“就几何、计时和星盘学而论,我有很多书,可以说应有尽有。”

他经营了 25 年的藏书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呢?非常难说。看他的中文著作似乎证据确凿。他亲口告诉我们他用过某某欧洲作者的著作。但是并不能由此断定,目前我们图书馆所藏的这些作者的那几部书就是他用过的。尽管根据此书是常见还是稀有,可以推测他用过的可能性的大小,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证据。所以对那些渴望一睹利玛窦藏书的采访者,我通常先给他们看的是丁先生^①所著的《天象学》(书目第 1291 号)^②;作者题词说是赠给他的学生的。其次是两个版本的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所著的《世界大观》^③;利玛窦在他的信中曾描述过它的罕见和珍贵,并提到其装帧的金碧辉煌。然后我有所保留地向他们展示一些利玛窦活着的时候丁先生出版的书。还有一些更早的有关宇宙学和数学的、不属于金尼阁藏书的,如《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第 2518 号)、彼得鲁斯·阿皮亚努斯的《宇宙学》(第 819 号)、约翰·舍恩纳的《文集》(第 2711 号)、杰马·弗里修斯的《宇宙天文学原理》(第 1672 号)。就这么几种是比较可信的了。在那些来源不明的书当中,也许还有。但是由于下述原因,对此

①Christoph Clavius (1537-1612),第一代耶稣会士,罗马学院教授,利玛窦的老师。据说是最后一位支持托勒密学说的学者。

②即利氏《浑盖通宪图说》之底本。

③即利氏《坤輿万国全图》之底本。

我们并不能过于乐观。

在利玛窦去世六年后的1616年5月,南京礼部副侍郎沈淮^①向朝廷控告新的外国宗教。8月20日北京礼部下令逮捕和驱逐传教士。南京的住堂被卖掉并捣毁了,内地的教堂被关闭,传教士们不是藏匿起来就是被驱逐出境。在此期间,北京的天主教士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试图以他们的影响力来取消禁令,却徒劳无功。根据1617年1月的皇帝谕旨,北京的神父也被驱逐到澳门,住堂被没收。他们3月18日动身,把利玛窦神父在栅栏的墓地^②交给两位中国教徒照管。直到1623年,龙华民^③和汤若望^④才重新进入他们的南堂住所。

在这七年中利玛窦神父的藏书命运如何呢?

在南京目睹并亲受迫害的曾德昭^⑤神父说:“我们的房子、家具,尤其是所有的书籍,都被洗劫一空。”也许在北京的书籍受灾要轻一些,因为打击不是那么突如其来。它们可能被交给在栅栏的两名中国教徒藏匿了起来;但是有多少书、是哪些书,没人提及过。

第二节 金尼阁藏书

利玛窦神父在临去世前制订过一项计划,要改良中国历法和翻译欧洲基本科学著作。他跟徐光启和李之藻讨论过这个计划。他写过信寻求必需的人才和书籍。他的继任人龙华民神父决定继续实施这项计划,派年轻同事金尼阁^⑥神父为此前往欧洲,同时根据中国教徒的一般需要,给他的使命增添了其他一些项目。

1613年金尼阁从澳门启程,于1614年11月底抵达罗马。1617年1月2

①沈淮,浙江乌程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万历四十四年发动“南京教案”,疏请查办外国传教士。1617年1月16日明神宗谕旨下,称西洋教士误导民众,参与谋反,令传教士俱遣赴广东,听还本国。后来沈淮归里,“南京教案”才平息下来。

②指滕公栅栏墓地,曾是一杨姓太监的别墅,由明万历皇帝赐葬利玛窦,后来成为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所在。自17世纪末,又被人称为“荷兰墓地”,以与正福寺附近的救世堂法国耶稣会士公墓“法国墓地”相区分。现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的北京行政学院院内。

③Nicolas Longobardi (1565-1655),字精华,意大利人,1582年加入耶稣会,1597年来中国传教,1609年前往北京,担任了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一度参加了修订历法的活动。

④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字道未,德国人,学者。在意大利学完数学、物理、神学和天文学后,1611年加入耶稣会,1618年来中国传教,曾任钦天监监正,官居一品。

⑤Alvaro Semedo (1585-1658),葡萄牙人,初用汉名谢务禄,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

⑥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比利时人,字四表,1594年入耶稣会,1607年来华。1613年2月返罗马向教皇保罗五世奏陈教务,在漫长旅程中把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回忆录手稿《利玛窦中国札记》翻译成拉丁文,并作了补充和润色。

日,身在布鲁塞尔的他就远征的结果给北京发了一份饶有趣味的报告。这份报告由耶稣会士埃德蒙·拉玛勒神父发表在1940年的《耶稣会史料汇刊》第九卷上,标题为“金尼阁神父为中国教会鼓吹(1616)”。渊博的编者同时还附了一篇追根究底的序言,为我们提供了我称之为“金尼阁藏书”的珍贵信息。我们毫无疑问要把这一切归功于金尼阁的热诚。他自己说过,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收集这批藏书更重要或者更耗费他精力的了。我们甚至可以从他的报告中获知龙华民神父接续的这项计划之大概。“我们必须向教皇请求在北京建立一所中央图书馆。为了易于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将奉献给他《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译本(即金尼阁所著《基督教远征中国记》)。而教皇的肖像将是这一赠礼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永久纪念。除了这个堪与欧洲第一流图书馆媲美的中央图书馆之外,我们还需要为其他的中国住堂建立较小规模的图书馆。”

在罗马,金尼阁神父的请求得到教皇保罗五世的热情支持。这一点可以从《基督教远征中国记》一书的献词上看出。他在献词中感谢教皇对中国的特殊体恤,特别是“这所图书馆的创立,它与教皇的荣耀相称,将成为基督教从罗马教廷传播到这个遥远国度的不朽纪念碑”。一年后,金尼阁在一份呈送教皇的备忘录中说,由于教皇的慷慨资助,他已经收集了约500册左右的书籍。他恳求教皇完成捐赠承诺,于是又得到了一千金币。耶稣会总长魏德莱神父也加赠了同样的数额。这笔款项付给了里昂的装订师霍勒斯·卡登,当时他正在为教皇图书馆的藏书做装潢。1616年5月,金尼阁在德国和低地国家穿梭来往。在米兰他带上了邓玉函^①神父,一起拜访了里昂、慕尼黑、法兰克福、美茵茨和科隆等图书重镇,所到之处皆激发起对中国的同情。除了预备献给中国皇帝和达官显贵的珠宝和工艺品外,还收到了捐助、书籍、数学和天文仪器。金尼阁在从科隆前往他的家乡杜埃,途经布鲁塞尔时,从那里给北京发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份报告。他说收集工作完成了。耶稣会总长表示不希望他在低地国家收集,因为她们正在遭受战争的蹂躏;也不希望在西班牙收集,以免激怒菲利普三世来反对传教事业。

在此金尼阁描述了教皇图书馆的内容。“除了文学、哲学和神学之外,天主教和其他种类的著作一般也包括在我们的收藏之中。这一部分包括医学、教会法、民法和音乐。至于数学,我几乎把现有的著作收罗备至了。说到书的豪华装帧,它们一律是红皮封面,烙有教皇的纹章和烫金的书名。我还努力收集大开本的书籍。”金尼阁补充说,他已经完成了组建图书馆的计划,也得到了龙华民神父所要求的教皇的画像。他忽略了一个细节:他所收集书的总数。他只告诉我们,这批藏书,包括天文和数学仪器在内,价值达一万金币,还不包括运费。

^①Joannes Terentius (1576-1630),字涵玉,瑞士人,迦利略的学生,意外成为耶稣会修士,跟金尼阁一起前来中国。1629年,他因精确预测出日全蚀而被明崇祯皇帝委以改革中国历法之任,但不久就离奇死去。

他接着谈了预定给其他教堂的小型藏书。他离开中国时有五个这样的教堂,分别在韶州、南昌、南京、上海和杭州。其中南京最为重要,金尼阁已经请求把它升级到跟南堂一样的地位,授予学院名称。他为这所学院保留了一份藏书,出自家乡杜埃他的家族。他的一位表兄让·德·圣·洛朗是兰斯神学院的院长和杜埃皇家学院的希腊文教授,把这些书留给了弟弟于贝尔·德·圣·洛朗。于贝尔是耶稣会士,正打算和金尼阁神父一起动身来中国,于是把这些藏书转赠给了南京。

至于其他的住堂,金尼阁仅仅写道:“我还有一份预定给我们教会的教皇赠礼尚未动用。那是西班牙主教们的战利品,我可以任意从中挑选五千册,将来分给其他住堂。”我弄不懂“西班牙主教们的战利品”是什么,编者对此也未作解释,不过提到,“金尼阁在这里表达的希望似乎因乐观而言过其实了。”我们知道他没有返回罗马去挑选这些战利品,所以这份赠礼的确还是“尚未动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他的藏书里面一本西班牙或葡萄牙文的书都没有了。

1618年4月,金尼阁从里斯本出发,于1620年7月22日抵达澳门。离开了七年以后,他发现传教事业已因沈淮教难而土崩瓦解。教堂被烧的烧、关的关,教士教徒花果飘零。他的满腔希望得到的是怎样的回报啊!他的书也不得不留在澳门,直到1823年南堂重新开放。

现在该谈这批书有多少流传至今了。

1. 教皇赠书

经过仔细寻找,我认为教皇赠书尚存534种457册。种数多于册书,是因为金尼阁偏好外观漂亮的大开本,即“大部头”。几本同样的著作被装订在一起,所以目录中频频出现“一册两本”或“一册三本”的记载。他甚至把不同作者的书多至七八种合订起来,所以目录中就有了许多“合订于XXX”的记述。

在这457册书中,有三分之二,即302册仍然带有教皇保罗五世的金色纹章(包括皇冠和钥匙,有些有他们波尔盖塞家族的盾徽,有些没有),另有耶稣会三联字母“JHS”会徽。虽然许多书已失去了霍勒斯·卡登的红色封皮,上面提到的纹章仍然可见,因为烫金的热烙铁在封面板上留下了痕迹。

其余的三分之一在中国重新装订过。这批书我们可凭如下特征判断其归属:(1)蓝灰色书口;(2)书脊缝有双带横肋;(3)一册里含有尺寸不同或数量不等的著作;(4)刊印日期早于1618年;(5)没有捐赠人、书主、图书管理员或其他人的印鉴或题识,这是出于对教皇这一贵重礼物的尊敬。

2. 圣·洛朗藏书

根据金尼阁神父的《不平凡的赠礼》,圣·洛朗藏书是如数携归的,但如今我们只能辨认出23种29册。他们都有圣·洛朗的签名。其中两本还有特制的藏书标(ex-libris)扉页:“此书原属兰斯神学院院长和杜埃皇家学院希腊文学教授让·德·圣·洛朗,他于逝世前将此书赠给了弟弟于贝尔。○○耶稣会记。”

按照金尼阁神父的计划,空白处是留着写“南京”两字的。可是等他从欧洲回来时,该住堂已烟消云散,而原本可以更改受赠教堂的书主于贝尔·德·圣·洛朗也在来华途中故世了,所以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书被转交给了南堂,可能比我们现知的 29 册还多。我倾向于再加上一批 1618 年以前的法文书,主要是埃斯普里·奥贝尔、纪尧姆·德·萨吕斯特·杜·巴尔塔斯^①、皮埃尔·沙尔东、若阿基姆·杜·贝莱^②,及其他人的著作。金尼阁是不会为中国购买这类书的。说他们继承自杜埃学院院长个人藏书倒是顺理成章的。

3. 第三种藏书

这批书金尼阁没有专门提到,但一定是他德国和意大利之行的收获物,因为他曾经说过在那里获赠和购买了许多书。我统计共有 200 种 143 册。这些书从来没有算在教皇赠书里,也均无教皇赠书的华丽装帧,年代都在 1618 年以前,书名页上都注有“中国教会”字样,而且所有书上的这四个字都出自一人之手。有的书上还出现邓玉函的名字或金尼阁名字的中文“金”字。有一些书上有“亚历山大·罗馈赠中国教会”的题识,大多是数学和天文学书籍,是亚历山大·罗给他儿子罗雅谷^③神父的。罗雅谷是金尼阁在欧洲招募的传教士之一。还有许多有关医学、化学和炼金术的书,我认为是邓玉函神父的。他在成为耶稣会士之前是著名的医生。这就使我们联想到,邓玉函和罗雅谷跟于贝尔·德·圣·洛朗一样,向中国教会捐赠了他们的私人藏书。最后,一些书上有其他的人名和题识,跟金尼阁途经的城市有关联,如慕尼黑、因斯布鲁克、因戈尔施塔特、卢万等。

这三部分书合起来共有 757 种 629 册。我已经说过,金尼阁在他的报告中没有提到他收集了多少书,我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任何欧洲文件。但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一致声称总数达七千部(册)。杨廷筠在《代疑篇》和《代疑续篇》中首先给出了这一数字。然而这只是以传闻为根据的大略估计,因为在《代疑篇》完成的 1621 年,这些书还存在澳门装箱未开。同样我们也不能否认,李之藻在他的《天学初函》和艾儒略^④的《职方外记》两书的序言中重申了这个数字,王徵的《奇器图说》和他们之后的许多人也都如此说。我们能据此就断定,这份藏书的十分之九都已遗失了吗?似乎不太可能。这么大的一场书劫应当在历史上留下蛛丝马迹的。

金尼阁有两句话易于让人对中国作者的说法产生怀疑。他对这份藏书,包括数学和天文仪器在内,估价为一万金币。这笔钱连装订七千册书都不够,更

①Guillaume du Bartas (1544-1590),法国基督教新教诗人。

②Joachim du Bellay (1522-1560),法国七星诗社重要成员。

③Jacobus Rho (1592-1638),字味韶,意大利人,1622 年来华,与汤若望同时入钦天监供职。

④Giulio Aleni (1582-1649),字思及,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自 1613 年起在中国传教 36 年,不仅是个神学家,也是个精通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学者。

遑论购买了。他还说：“我很愿意给你们一份所有书的目录，但是做不到，因为写书^①已经写得我喘不过气来了。”很难设想一位代理人在旅途中会突发奇想，要编一份七千册书的目录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即使每册书只需要一行字来描述，写出来的目录也会是三百页的一大本呢。

那么如何解释“七千部”这一说法呢？这可能是按比例估算的。很显然，本馆所藏的中文书和欧洲书是不能按册对比的。一册木刻中文书不会小于30公分高20公分宽，只有约一百页，每页十五到二十行字。而金尼阁神父的最大开本书，如并非最大本的《圣伯尔纳多全集》一书，高39公分，宽24公分，每页76行字，共1353页。这是一种极其不成比例的状况。因此要给那些没有亲临图书馆的人描述这份藏书的规模，除了按中、欧两种书的比例约估外，别无他法。然而即使准确，这种比例难道是等效的吗？

第三节 后来的收藏

金尼阁藏书构成了南堂图书馆最古老和最丰富的部分，后来的收藏没有改变这种状况。书当然有增加，因为这所学院是副省的中心，也是在钦天监供职一个半世纪的传教士的住堂。在这些书上我们也有有趣的发现，但是说来话长，我们还是专注于对这批藏书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历史事件吧。

在明清易代之际，即1644年5月李自成焚烧北京城时，图书馆也身临险境。汤若望神父说，已经刻好了的天文学著作的版片竟然奇迹般地在大火中幸存下来。图书馆的三千册书也安然无恙。

二十年后又遇到了新的危险：杨光先教难。汤若望神父于1664年9月25日被下狱受审。11月，北京的神父被监禁，杨光先将南堂收为自用。1665年1月，欧洲的科学方法被宣布为邪术，汤若望神父和其他五位任职钦天监的传教士被判处死刑，天主教受到查禁，内地的传教士被驱逐到广州。意外的转机出现在康熙登基的1669年^②，他恢复了于1665年8月15日去世的汤若望神父的名誉，归还了南堂，又命南怀仁^③神父为钦天监监正。利类思^④神父在为收回教堂呈给皇帝的请愿书中说：“由于杨光先的诬陷，我们的书被烧，我们的房被毁。”这句话说得太泛，不能当真。栅栏墓地是被破坏了，不过南堂还是幸存下来。至于这些书，我想利类思神父的意思是指被禁了，以阻止天主教的传播。杨光先在占据南堂的五年中，尽管有意销毁对手作为武器来证实他的愚昧的藏

①当是指把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回忆录手稿《利玛窦中国札记》翻译、增写成拉丁文的《基督教远征中国记》。

②原文如此，康熙实际登基（继位）是1662年。

③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字敦伯，一字助卿，比利时人，耶稣会士。1658年来华，1669年接替汤若望任钦天监监副，也曾铸造红夷炮助清帝国。1688年逝世于北京，与利玛窦、汤若望埋在同一个墓园。

④Ludovicus Buglio（1606-1682），字再可，1622年1月29日入耶稣会，1637年来华，卒于北京。

书,但因为南堂的主人并没有真的被杀头,并没敢把计划付诸实施。

漫长的康熙盛世,他的注重科学、同情传教士,有利于传教事业的普遍发展,给了已有事业新生。然而在他的继承人雍正治下,教难又开始了。1723年福建巡抚驱逐了本省的多明我会教士。他的禁教令报到北京,不仅得到批准,而且被传到整个帝国。经皇帝认可,所有传教士都被送往广州监禁。

奇怪的是,北京的教堂照常开放,神父也可以继续工作。戴进贤^①和徐懋德^②仍留在钦天监,并有雄心勃勃的未来计划。这是从1732年9月23日宋君荣^③神父致苏西神父的一封信中获得的证据。耶稣会士裴化行^④在巴黎天文台的得里斯勒文件中发现了这封信,出于好意给了我一份。宋君荣时为北堂的图书馆长,写信是希望为图书馆购买很多书籍。

为了显示北堂藏书的匮乏,他大赞葡萄牙同事的住堂南堂图书馆的富庶。他说:“他们有一个很老的图书馆,历史、圣经诠释、神学、数学等方面的书非常齐全。还有许多极佳的医学、外科学、拉丁文和法文的自然史、物理、天文、几何等方面的书。他们决心为这个国家建立一所完备的图书馆,花了很多钱从意大利、荷兰、法国和英国购买书。这些费用加上他们花在设备上的钱,清楚地表明葡萄牙人一定从欧洲得到过大量援助。”

宋君荣神父在向他的祖国呼吁时或许有夸大其词之嫌。他想打动巴黎的教会首长。不管事实到底如何,我们能确定的南堂藏书仍然是546种738册。

大部分书均有“北京耶稣会学院”或“副省”的标记。所有属于耶稣会副省的书都归入了这一类,尽管上面并没有住堂的标记。

1773年耶稣会被取缔,还俗的耶稣会士和传信会教士争夺该会财产。被葡萄牙人认可的汤士选主教到达,才结束了这场争执。他获得了南堂和他的教区内副省的全部财产。据记载,遣使会士取代耶稣会士,取得了属于葡萄牙的南堂的管理权。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在汤士选主教去世后,三位遣使会士在一小段时期内管理了这个教区,但没有正式的头衔,不过一直得到遣使会的批准和保护。

罗马教廷最后决定取缔北京教区,而最后一位代理主教孟振生予以拒绝,建议主教直接受传信会管辖。1856年教廷接受了他的建议,此时才把教堂划归了遣使会士,并任命孟振生主教作北京和直隶北境教区的首任主教。

①Ingance Kogler (1680-1740),字嘉宾,德国耶稣会士,1717年到北京,任钦天监监正29年,卒于北京。

②Andreo Jackson (1689-1743),字卓贤,英国人,1716年来华,1727年任钦天监监副,也卒于北京。

③Antoine Gaubil (1689-1759),字奇英,法国人,1721年来华,1742至1748年任北京法国传教区会长。

④Henri Bernard 或 Bernard-Maitre (1897-1975),法国人,20世纪20年代末来华传教,1949年后离去。

第二章 东堂藏书

东堂是葡萄牙耶稣会在北京的第二所住堂,由利类思和安文思^①神父开创。1647年张献忠被击败,他们在四川被清军俘虏,于1648年带到北京,在理藩院扣留了几年。1655年11月,顺治帝释放了他们,并赐给他们一所房子和银两。所以东堂图书馆比南堂图书馆晚50年,而且其重要性也从未超过南堂。东堂的神父从未超过两三名,也从来不算学院,只是南堂的附属。其图书馆也为南堂服务,实际上由南堂控制。后来,一场大火彻底地结束了它的图书馆。

在葡萄牙女王的要求下,遣使会士前来接收了耶稣会的澳门学院和东堂教区。福文高^②和李拱辰^③于1801年首批到达,受到汤士选主教的正式任命。

高守谦^④和毕学源于1804年到达。

一年之后,由于南堂的最后一位耶稣会士索德超^⑤神父去世,钦天监的监正职位落到了圣方济三会教士汤士选主教身上,福文高和李拱辰两位遣使会士作监副。1808年7月6日主教去世。他的继任是遣使会士若阿基姆·德·索萨·萨赖瓦,于1805年7月在澳门被祝圣,可是无法来北京,所以推荐了他的东堂同事李拱辰神父为代理。李拱辰于是搬到了南堂。

现在我们谈1812年的事。东堂的三位神父感到教难将临,并知道他们会遭搜查,想要藏匿书籍和圣器。他们夜间工作时不慎失火,耶稣会士的和他们自己的书都烧了,住处的一部分也未能幸免,但是教堂保住了。然而皇帝命令他们移住南堂。他们随身带走了13册书,其中一本有教堂创建人利类思神父的签名,另一本有安多^⑥神父的签名。所有的书上都有东堂的正式名号“圣若瑟堂”。

毕学源主教被任命为南京主教,由汤士选接任北京主教,但一直未能离开

①Gabriel de Magalhaens (1609-1677),字景明,葡萄牙人。1640年来华,先到杭州,后去成都与利类思共同传教。张献忠入川,命人找到二人,赐以馆舍居住,并命他们制造天文仪器。清兵前来,张被清兵杀死,两神父亦为清军俘获,由肃王豪格送往京师,从此在清廷服务,受顺治优遇。逝于北京,葬阜城门外。

②Domingos Ferreira (?-1824),1801年10月授钦天监监副,1808年补授钦天监监正。卒于北京。

③Jose Ribeiro (?-1826),1801年来京,1805年授钦天监监副,1823年补授钦天监监正兼管算学馆。卒于北京。

④Verissimo Monteiro Sera,1804年来京,1820年北堂南弥德被逐,代钦天监监正,1826年被放逐澳门。

⑤Joseph-Bernard d'Almeida (1728-1805),字越常,1759年进京,1781年补授钦天监监副,1793年升监正。

⑥Antoine Thomas (1644-1709),比利时耶稣会士,1685年来华。

京师。他从东堂转到法国传教士的北堂帮助南弥德^①神父。北堂在 1812 年 8 月 12 日吉德明^②神父去世后,八十高龄的原耶稣会士贺清泰神父^③是唯一健在的人。

第三章 北堂藏书

首批五名法国耶稣会士于 1688 年 2 月 8 日抵达北京,比利玛窦神父迟了一个世纪多一点。他们是以法国“国王科学家”的身份奉国王之名来华的,由皇帝赐俸。其实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传教士。康熙将张诚^④和白晋^⑤留在首都,寄居南堂。洪若翰^⑥、李明^⑦和刘应^⑧神父与葡萄牙教士们一起遣往内地。张诚很快就有幸为康熙效劳,跟南堂徐日升^⑨一起,参与了 1689 年尼布楚和约的签订。此后不久,洪若翰以奎宁治愈了康熙的疟疾。皇帝在皇城里南海边给了神父们一所房子,并慷慨地帮助他们建立教堂。1693 年 12 月 19 日住堂落成开放。它成为法国传教团在华的中心,并于 1700 年 11 月 3 日宣布脱离葡萄牙而独立。

我们没有他们旧图书馆的材料,因为除了上面引用的宋君荣神父的信,其他的差不多荡然无存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他在讨书的时候,自然会隐瞒所有而强调所需。他承认“他们有大量的代数、几何、天文学等方面的书,还有建筑学、医学、外科学、自然史、物理学方面的书,以及大批宗教方面的书”。他还有《学院论丛》和《特雷武文丛》,想要收齐这些丛书。他也提到,他的图书馆里有 10 部传记、12 部通史、4 种教会法规、24 种神学、13 种圣经、7 种教父著作集、13 部各种词典等。不过他还想要耶稣会及其传教史,以及各种工艺实践的

①Louis Francois Lamiot, 法籍遣使会士, 1797 年来华。

②Jean-Joseph Ghislain (1751-1812), 法国人, 1784 年来华, 卒于北京, 葬正福寺。

③Louis de Poirot (1735-1814),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画家。1770 年来华, 不久便进入宫廷供职, 卒于北京。

④Jean 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 字实斋, 法国人。1688 年抵北京, 与白晋同在宫廷供职, 教习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化学等西洋科学知识。1689 年, 张诚被委任充当中俄尼布楚边界谈判的译员。1690 年入宫为康熙帝讲授欧几里得原理、实用几何学及哲学。1696 年, 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1707 年卒于北京。曾主管北京法国会院, 后来任耶稣会总会长。

⑤Joachim Bouvet (1656-1730), 字明远, 法国人。1678 年加入耶稣会。除与张诚同在宫廷供职外, 还与其他教士赴各省测量绘制《皇舆全图》, 又曾奉康熙帝命研究《易经》, 著有《易经总旨》。后卒于北京。

⑥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 字登时, 法国人。

⑦Louis-Daniel Le Comte (1655-1728), 字复初, 法国人。

⑧Chaude de Visdelou (1657-1737), 字声闻, 法国人。

⑨Thomas Pereira (1645-1708), 字寅公, 葡萄牙人。1633 年加入耶稣会, 1672 年到澳门传教, 后到北京, 在钦天监帮助修订历法, 又担任宫廷乐师。1691 年负责耶稣会中国教区的事务。1706 年担任耶稣会中国教区副会长, 不久在北京去世。

书。他说：“我们没有在柏林、霍尔、彼得堡等地印刷的书，地图很少，没有版画……我们需要反偶像崇拜、反自然神论等方面的书……圣经诠释学很少，早期基督教作家的几乎没有。”

当然总会长为宋君荣神父尽了其所能。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现存的书籍跟他的索书单来验证。可是本文篇幅有限，这里用也是由裴化行神父发表的一份较小的书单来证实。它是北堂上司即耶稣会会长巴多明^①神父给德·弗雷蒙神父的，于1732年8月13日到达巴黎，比宋君荣神父的信早几个月。在他寻求的22种书中，我发现尚存19种，其中3种有复本。但是这些书中有10册来自北堂，8册来自南堂，4册种来历不明。我们怎么解释法国人寻求的书南堂也有呢？裴化行神父也注意到了这点，认为这是由于两座教堂相互竞争造成的。“他们当年进行着友好竞争，以致常常重复购买了贵重的书籍，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南堂有的书北堂也有。”宋君荣神父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更为直截了当：“根据可靠的消息，我知道葡萄牙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在所有方面都超过我们。”我们可以想见，他并不希望让他们如愿以偿，所以两个图书馆都大量采购。尽管如此，北堂图书馆的损失仍然令人惋惜。

为了解释这一切，我必须再回顾耶稣会被取缔的那个关键时期。最后的神父们，特别是晁俊秀^②和钱德明^③，为使他们的遗产交到法国人手中尽了最大努力。他们最终成功了。三位遣使会士罗广祥^④、吉德明神父和巴茂正^⑤修士以教廷和法国国王的名义来接收遗产了。5月8日汤士选主教在教堂宣布传信会的命令和国王路易十六的信，承认这一移交。还俗的耶稣会士在北堂的老住所与遣使会士和睦相处，继续生活了28年。

当最后一位耶稣会士贺清泰神父于1813年12月13日去世时，最初的三位遣使会士已经不在，只有南弥德神父一人。

在法国，遣使会已经因大革命而被遣散了，尽管一些传教士已经来到中国，像后来殉教的刘方济^⑥神父。但是自从1805年嘉庆下令禁教以后，没有人

①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字克安，法国人。1685年入耶稣会，1698年来华，1741年卒于北京。

②Francois Bourgeois (1723-1792)，字济各，法国人。1767年来华。1789年制成圆明园铜版图二十幅。卒于北京。

③Jean Joseph Marie Amiot (1718-1793)，字若瑟，法国耶稣会士，1750年奉派来华传教。他也是一位大学者，著有《中国古今音乐篇》、《满汉词典》、《多体文字对照词典》（梵文、藏文、满文、蒙文、汉文），以及《孔子传》等。

④Nicolas-Joseph Raux (1754-1801)，法国人，神学教授。1784年来华，1788年任钦天监监正。死于北京。

⑤Charles Paris (1738-1804)，法国人，1784年来华，卒在北京，葬正福寺。

⑥Fiancious Clet，又名刘格来和刘克莱，遣使会会士，1820年以“蛊惑中国人民”和“冒犯皇上禁令”罪，在武昌被处死。

能再进入北京。当南弥德神父于 1818 年跟毕学源主教及三位中国传教士还在继续传教时,刘方济神父此前已在湖北被捕,被带到武昌。审讯期间,发现他的上司是北京的南弥德神父。根据武昌当局的要求,南弥德于正福寺的法国墓地被捕。那天他是和他的神学院学生一起去那里上课的。捕快们不许他回城,而是直接把他押送到武昌。在与刘方济神父对质后,花费了一大笔银子,他才被宣布无罪释放,但根据律法他被驱逐出境。在提名遣使会士薛玛竇^①神父为北堂主持后,他动身去了广州和澳门。薛神父是一位德高望重、谨慎细心的人,但是作为一位中国人他不能接受欧洲人的财产,于是便叫南堂的高守谦来主持管理。

南堂的两任遣使会士福文高于 1824 年去世,代理会长李拱辰神父于 1826 年去世,毕学源主教不得不去南堂做管区的主教,北堂只剩高守谦神父独自一人了。他假意告假去欧洲看望老母,试图争取让别人来北京代替。皇帝准了他的假,却叫他不必要回来。这一下弄巧成拙,他不得不走了。

此事发生在 1827 年,北堂就此关门大吉。皇帝本人可笑地花了 5000 两银子买下北堂,拆毁了教堂,其余房舍赐给了一位官吏。薛神父尚来得及搬走他的家具、书籍和衣物,和他的神学院学生一起去了南堂。两年以后,他被指控拿走了北堂的财产,不得不逃到长城以北的蒙古,在西湾子^②的小基督教中心驻留下来,并把它变成法国传教团的中心。藏书被运送到正福寺墓地,委托给一位姓图(T'u)的教友照管。他是皇族的后裔。

1835 年孟振生主教在从澳门到西湾子的途中,在遣使会士和耶稣会士并肩长眠的这个墓地停留了三天。1835 年 8 月 1 日,他给传信会总会长写了一封感人泪下的信。在谈了住堂、庭院和墓地之后,他提到了这批图书。“右边有一间大屋子,里边乱七八糟地堆放着许多欧洲书籍,原属于丰富的法国北堂图书馆。耶稣会的神父以前从欧洲花了极大的代价才收集到这些书,多可惜啊!在此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无法带着它们——即使不为我们招灾惹祸,也是一种负担。”孟振生主教来不及把这些书藏匿起来。他的到来已为人所知,所以立即动身去了蒙古,甚至没能进城去见毕学源主教。不过他确实把一些中文书的雕版和一些外文书带去了蒙古。一位中国遣使会士韩约瑟神父时常秘密地去正福寺,挑选一些孟振生主教需要的书。一位宣化府的商人定期去北京,经常把书藏在行李中带到西湾子。不过这并未持续多久。1838 年 2 月,西湾子一位名叫孔若望的教徒到太原府搬取朝鲜代理主教范世亨^③的行李,打算放在正福

①薛玛竇(1847-1893),山西人,遣使会会士。

②现为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城。自从 1700 年天主教传入西湾子村以后,这里曾长期是天主教蒙古教区的主教座堂,成为天主教向长城以外传教的主要基地。以大教堂为中心,西湾子逐渐发展成市镇。1934 年由张北县析置崇礼设治局,1936 年改设崇礼县。

③Laurent Marie-Joseph Imbert,一名英伯,曾在新加坡传教。

寺,等朝鲜贡使新年来向皇帝进献贡物时交给他们。可是他在途中遇到抢劫,惊动了官府,被跟强盗一起带到了衙门审问。在那里,范世亨主教的行李被发现,他也成了嫌疑犯。他供出了要把行李带到正福寺。于是正福寺的看守人被捕,后来又逮捕了其他九位教徒。这些人都是皇族,跟图教友一样,他们的先人在雍正时由于信教而被流放,贬为普通旗兵。就这样,孔若望和他的十位同犯被处以流放。皇帝在谕旨中严厉斥责“这些不守祖坟,也不去京城为他效力,却信仰异教,在正福寺守护外国坟墓的家族成员”。

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惶恐万分,销毁了一切带洋味的迹象之后,离开了正福寺。孟振生神父写道:“宗教物品丢了,家具卖了,书被埋在庭园地下。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毫无希望地失去了。”这场灾难过去六年后的1844年3月11日,他写信给他在澳门的代理人吉耶神父,说:“我永远不会停止要求。我们失去了一切。珍贵的藏书被埋在了地下,到发生范世亨主教行李事件时已全都化为腐物了。”

这话还是有点夸张的。他有过3年的时间运书到西湾子。薛神父及他的学生也带了一些去。我们至今还有290册(202种)有“北京耶稣会”题字的书。而这仅仅是被保存下来的部分。

1840年,孟振生神父被任命为蒙古代理主教,兼北京教区主教。1847年他移住北京西南的一个天主教村庄,安家庄。10年之后,教廷改组了北京教区,将其分为三个教区,任命孟振生为北京和直隶北境主教。1857年7月17日任命他在西湾子的继任孔主教^①为蒙古教区主教。他们俩把西湾子的藏书一分为二,孔主教留下大部分,因为孟振生主教将会拿到丰富的南堂藏书。

后来蒙古教区被斯格脱传教团接管。但只有两本书幸存,是法国耶稣会的遗物。一本《超性学要》的初版本,是利类思神父从圣·托马斯的《神学大全》翻译而来的;另一本是孙璋^②神父的《满蒙法大辞典》手稿,这我们图书馆原来就有(第382号)。西湾子教区的现任主教石德懋^③从潍县返回途中,把他们的那一本留给了我们的图书馆寄存。

第四章 西堂藏书

西堂是传信会教堂,有时也称意大利教堂,是北京四所老教堂中创建最晚

①Florent Daguin(1815-1859),法国人,遣使会士,1839年晋升神甫,1848年祝圣为主教。

②Alexander De la Charme(1695-1767),字玉峰,法国人。17岁入耶稣会,1728年8月抵北京,自此以后,终其生39年常驻北京。曾翻译《礼记》为法文、《诗经》为拉丁文,并著有《性理真诠》。

③Leone Giovanni M. De Smedt(1881-1951),比利时人,圣母圣心会士,1931年12月14日被任命为西湾子代牧区主教,1946年4月11日升为西湾子教区主教,1951年11月24日在张家口监狱去世。

的一个。它由 1701 年跟教廷特使铎罗^①一同奉派来中国的遣使会士德里格^②神父创建。他在穿越美洲和菲律宾群岛途中多次遇险,耽误了行程。等他 1711 年 2 月 5 日抵达北京时,特使已经回去三年了。他也未能从皇帝那里为传信会的教士要到一处专门住堂。皇帝说要传教士统一居住。因此马国贤^③、山遥瞻^④和德里格不得已去了北堂和南堂。

20 年后,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为了中国礼仪问题又派遣了一位新使节,即亚历山大城主教嘉乐。1721 年 2 月 17 日他在海淀畅春园对面买下一处房子,在与康熙交涉期间就住在那里。回国时他把房子留给了马国贤神父,供传信会的神父使用。但是德里格神父认为,传信会在城里有房子和教堂才合身份和有面子。1723 年康熙驾崩,他如愿以偿,因为他作为宫廷音乐教师教过新皇帝雍正。

他在城的西北角买下一处房产,修缮后交给传信会那些不依赖葡萄牙的教士使用,包括圣芳济会士、奥古斯丁会士、圣衣会士、浸信会士等。那些住在海淀的人可能在 1726 年底迁入。

德里格 11 月 25 日向传信会报告说:“我买这所房子是为了传信会的传教士,我已请他们全都来这里住了。”

其实来的人一直都不多。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没有教区;他们最近的传教点在山东。而在宫廷里供职的人继续住在海淀。他们的藏书从未繁荣过。没有带“西堂图书馆”标记的书。所以我把那些非葡萄牙或法国耶稣会教士的书归在了西堂名下。许多书有这样的标识:“属于北京和山东的圣方济各会”。有些书上有副会长康和之(Bennardin della Chiesa)主教,奥古斯丁会士山遥瞻、马国贤神父,圣衣会士约瑟·玛丽亚·圣特蕾莎(Joseph Maria Sta Theresa)等人的签名。我统计了一下总数,仅有 62 种 102 册。其中最珍贵的部分是嘉乐主教留在海淀的书。我想这些书是传信会的神父移住西堂时带去的。

西堂最后创建,却最先瓦解。1811 年 6 月 19 日,嘉庆颁旨,只要南堂的三位遣使会士供职算学馆,或许还有北堂的南弥德神父在宫廷当翻译,其他人禁止离开住堂去传教。留在西堂的有圣约翰和浸信会士孔福尔特^⑤和王雅哥比^⑥,

①Charles Thomas Maillardde-Toumon。1705 年 4 月 5 日到达广州,12 月抵达北京,3 日在热河行宫觐见了康熙帝。1706 年被驱逐,押解到澳门。1710 年卒于澳门监狱中。

②Teodoricus Pedrini(1670-1746),意大利人。来华后被康熙皇帝任命为专门教授皇子西学的教师。西堂藏书里有他写的献给康熙皇帝 Sonate 奏鸣曲乐谱。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 80 周年时,中央音乐学院师生专门演奏了这部作品的部分章节。

③Matteo Ripa(1682-1745),意大利人,1710 年来华,后成康熙皇帝的宫廷画师。详见《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④Guillaume Fabre Bonjour(1670-1715),意大利人,1710 年来华,参与了测绘制作《皇舆全览图》。

⑤Emmanuele Conforti,意大利人。

⑥Giacomo Ferretti(1754-?),1783 年来华,离华后去泰国传教。

奥古斯丁会教士德天赐^①和安塞尔姆(Anselmo)。最终他们忍受不了严密的监视,宁愿弃堂它去。朝廷准许他们卖掉财产,但无人敢买教堂和住房。最终还是皇帝买下并将其拆毁了。

他们原打算把藏书移交给北堂的南弥德神父,可是他感到责任重大,无法承担。幸好如此,不然它们就会在那里被毁掉了。这些书于是被送到南堂,交给了代理主教李拱辰神父。

这批书最后由俄国教团保存了下来。

第五章 特使嘉乐主教藏书

铎罗特使来华之后,康熙派艾若瑟^②和陆若瑟^③出使罗马,期待教廷修改成命。可是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审视再三,仍然坚持铎罗特使 1706 年 1 月 25 日在南京公布的 1704 年通谕^④。

康熙皇帝等了十年,传达他有意接受教皇通谕的信才到达罗马。所以罗马教廷决定再派遣一位使节赴华。1720 年 3 月 25 日,嘉乐主教从里斯本启航,9 月 23 日抵澳门,12 月 26 日到北京。

但是不久情况就明了了,皇帝根本就没有改变主意。尽管特使作了一些让步,皇帝却毫不退让。特使受到比他的前任更差的对待。他在北京短暂逗留,3 月 1 日受命辞行,第二天就得离去,以至于连藏书也无法带走。这从那些书上的题识可以得到确认:“亚历山大主教从罗马携至北京的遗书”。“遗书”两字表明他来不及安置。

这是一批为旅途和特使将要会面的人而收集的书,很难算得上为图书馆准备的专藏。在长达六个月的航行途中,他有的是闲暇,需要消遣。这些书总共有 51 种 69 册。除了一本尼古拉·德·费尔(Nicolas de Fer)的《地理学及地球史导论》是法文书外,其余均为拉丁和意大利文书。最多的是关于教规和民法的,共 20 册。珍本有《罗马教廷通谕汇编》,即圣典学者法根尼(Fagnani)、贝尔纳·凡·埃斯彭(Bernard van Espen)、科拉多(Corrado)、卡巴修(Cabassut)、贝莱蒂

①Adeodato di Sant' Agostino (1760-1821), 1783 年来华。

②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 (1662-1720), 又名艾逊爵,法国人,1695 年来华,1708 年出使罗马,1709 年到达,1719 年回程途中去世。

③Jose Ramon Arxo (1663-1711), 西班牙人,1684 年来华,1708 年出使罗马后返回西班牙。

④历史上,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而采取的尊重中国文化的做法,引起了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传教士的反对,由此爆发了著名的“礼仪之争”。1645 年罗马教廷向中国天主教徒正式发出了禁止称造物主为“上帝”和禁止尊孔祭祖的命令。铎罗来华交涉,不敢正面反对康熙,在南京以公函形式公布了教宗的禁令。康熙知道后大为震怒,立即下诏将铎罗押解到澳门拘禁,要愿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领“印票”,票上写“西洋某某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回复西洋,已经来京朝觐陛见,为此给票”,并签名遵守利玛窦规矩,凡拒绝领票者一律驱逐出境,同时派使节到罗马交涉。

(Belletti)、巴尔沃萨 (Barbosa) 等人的注释汇编。此外还有弗拉戈索 (Fragoso)、路易丝·诺格拉 (Louis Nogueira)、圣查尔斯·博罗梅奥 (St Charles Borromeo) 和梅尔基奥尔·希托普 (Melchior Hittorp) 的著作。特使在长途旅行中似乎更喜爱读历史来打发时光。有通史、教皇史、罗马史、低地国家独立战争史 (第 2878 号)、征服墨西哥史 (第 3484 号) 等,共 15 种。他又带了些实用性的书,如卡斯纳迪 (Casnedi) 的《或然论辩》(此书当时刚在里斯本出版)、《J.B.塔韦尼耶土耳其和印度游记》(第 3507 号)、奥迪 (Oddi) 的《日晷仪》(第 3382 号)、弗朗西斯科·米隆尼 (Francesco Miloni) 神父的《议会里的传教士》,等等。

这批珍贵的藏书由于进入了西堂图书馆而幸存,后来送到南堂,再由俄国教团保存了下来。

第六章 主教藏书

北京的主教职位创立于 1690 年,一直持续到 1856 年。在这 166 年中,共有六位主教和四位代理主教,但是只有两位入驻过南堂,即耶稣会士索智能,1740 到 1757 年;圣芳济三会的汤士选,1785 到 1808 年。

他们的藏书似乎是一次建成的,像教皇保罗五世的一样,都是一样的欧洲式装潢,并有主教的印章。

第一节 索智能主教藏书

共有 93 种 115 册。大多有关教士和传教,如神学、辩论、决疑、牧书、教会法和圣经,以及传教学和耶稣会史。

我只发现一册数学、一册天文学的书,没有异教史、地理学、科学等方面的书。这种书很常见,这位耶稣会主教要看想必可以在南堂找到。

第二节 汤士选主教藏书

共有 228 种 512 册,其重要性与教皇保罗五世的藏书相同,只是更现代一些,因为晚了两个世纪。这也是其中有许多法文书的缘故,占藏书的三分之一,78 种 195 册。另一特点是种类丰富。仅就法文部分而言,就有 15 种地理学,11 种护教论,10 种数学,6 种教育学,5 种艺术和手工业,其他则为化学、物理、医药、机械、制版等。这是一份保护得最好的藏书,同索智能主教的书一样,装帧完好如初,在移交俄国教团保存之前,从未离开过南堂。

第七章 住堂藏书

在我们回顾的这两个世纪中,内地的传教团当然不如北京的稳固。他们有四次受到驱逐的威胁。康熙 1667 年继位^①之后,他们一度平安无事。到了 1717 年,因为要他们领“票”,许多人就离去了。正好 50 年。在雍正和乾隆朝,他们逐渐衰落。随着耶稣会的受压制,内地的传教士变得寥若晨星。当 1773 年克雷

^①原文如此,康熙实际登基(继位)是 1662 年。

芒十四世取缔耶稣会时,就只剩下十个神父了。

12年后,当27名传教士被捕送北京时,在内地找到的唯一一位耶稣会士是80高龄、双目失明的石若翰^①神父。他歿于途中。这些年中十个小型藏书从荒废的传教住堂汇集到了南堂。它们都属于葡萄牙副省。

第一节 济南藏书

济南住堂留给我们75种82册书。大部分书上有“济南府住堂藏书”的字样,而且笔迹相同。有几本书签着P.法伊拉(Faillat)的名字。我想这就是出生于布雷西亚的法安多^②,1700年康熙朝时来山东的传教士。

我要特别提一下由陆若汉^③送给龙华民的3581号书。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我们的书因为所附带的逸闻轶事而愈加珍贵。这位陆若汉神父在加入耶稣会前一直是日本邦戈(Bongo)^④亲王的士兵。1614年他被日本驱逐,来到了澳门。1630年被选为葡萄牙炮兵队的牧师兼翻译,派到北方迎战鞑靼入侵者。他们的指挥官特谢拉^⑤在山东登州之役中阵亡。当时登州城的司令是天主教徒孙元化^⑥。

孙元化由于失职,和他的副将,也是天主教徒的张焘一起被处死。他的长官、名作家王徵却由死刑改为流放^⑦。王徵曾经邓玉函神父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并跟他学习机械。至于打开山东传教大门的龙华民神父,每年都要从北京回到那里呆上几星期或几个月,并且一直坚持到七十九岁高龄。这些都是费赖之^⑧神父告诉我们的。

第二节 镇江藏书

共44种42册,均有“此书属于镇江住堂,(副省会长)杨若望^⑨”之类的

①Jean-Baptiste de La Roche(1704-1785),法国人,1740年来华。

②Antonio Faglia(1663-1706),意大利人,1694年来华,先到广州,1700年到山东,死于浙江嘉兴。

③João Rodrigues(1561-1633),葡萄牙人,1610年来华。此前在日本德川幕府中担任通译。

④Prince of Bongo,在其他文献中有拼作Bubgou或Bungo的(见何高济译《大中国志》第206页,译作“庞高王”),疑即日本战国时代九州的后丰后国(今大分县)领主大友氏。其第二十一代领主大友宗麟(1530年1月31日-1587年6月1日),是位天主教大名,天主教洗礼名Don Francisco。

⑤Goncalvo Teixeira(?-1632),旧译公沙的西劳,率领一百多名葡国军士自澳门来华助战。死后经兵部尚书熊明遇疏请追赠为参将。

⑥孙元化,字初阳,号火东,江苏嘉定人,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曾师事徐光启学习火器和数学。崇祯三年(1630),孙元化为登莱巡抚。

⑦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孙元化的下属孔有德在吴桥叛变。崇祯五年,登州官兵与叛军大战于登州城东南,由于张焘所率的辽兵突然引退,且半降于贼,登州陷落。孙元化本人自刎不成,与宋光兰、王徵(监军)等为叛军所掳。后虽被叛军放回,却为崇祯帝斩首弃市,王徵则遭遣戍。

⑧Louis Pfister(1822-1889)。

⑨João de Saa(1672-1731),一名杨若翰,葡萄牙人,1694年来华,1725至1728年间任中国副省会长。卒于澳门。

题识,文字略有变化。镇江的教堂和住堂由毕嘉^①神父所建,但是几乎立刻就在杨光先教难中毁掉了。杨若望神父任中国副省会长是在1727年,藏书可能也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

第三节 杭州藏书

只有31种35册。大多数书上有“杭州住堂”字样,也是最老的一批,日期是1661年。其中四册属于卫匡国^②神父,他是那一年在杭州去世的。其他书上有“杭州副省会学院”或类似的字样,其中年代最早的是1713年,表明那时它已是一所学院了。

第四节 淮安藏书

藏书不多,共37种43册。将近一半是法文的,两种是佛拉芒文。除了“淮安教堂”字样外,几乎都有万惟一^③的名字。他生于布鲁塞尔,说法语和佛拉芒语。他在这座城市工作了几年后于1703年在那里去世。很可能是他的上级下令将他的书交给这所教堂的。在第1995号书上有用拉丁文写着这样意思的话。

第五节 南京藏书

金尼阁神父在罗马为南京争得了学院称号,计划把圣·洛朗藏书给他们。但在68种67册标有“中国南京副省会”的书上,没有一本有圣·洛朗院长或他弟弟于贝尔的藏书标志。除了六册耶稣会会规和章程外,这些书均晚于金尼阁的远征,而这六册书并不可能属于圣·洛朗藏书。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金尼阁改变了那批藏书的目的地,在1623年把它们和那些能脱身的神父一起送到北京了。南京住堂在1634年由毕方济^④神父重建。

第六节 正定府藏书

这16册书要归功于高尚德^⑤神父,他说这些书都是他买来或收集来的。四本来自马国贤神父,其中有两本购于1734年7月10日和20日。马国贤神父带着教廷赐给铎罗特使的枢机主教帽子从罗马来。在给康熙当了12年的画师后,1723年带着五名中国学生重返欧洲,希望在那不勒斯建立一所神学院,培养中国本土牧师。这所学院的第一批牧师于1734年抵达中国,而他的书正好是同年在北京买下的!

①Joannes Dominicus Gabiani(1623-1694),意大利人,字铎民,1656年来华,长期在江南传教。卒于扬州,葬城外教徒墓。

②Martinus Martini(1614-1661),意大利人,字济泰,1632年加入耶稣会,1643年来华传教,1661年6月2日病逝于杭州。

③Guillaume Van Der Beken(1659-1702),比利时人,1694年来华,1702年2月2日卒于淮安,惠泽霖所记恐有误。

④P.Franciscus Sambiasi(1582-1649),意大利人,字今梁。1610年抵澳门,3年后至北京,后又去上海嘉定、淮安、无锡。卒于广州。

⑤Carlos de Resende(1664-1746),葡萄牙人,字怀义,1696年来华,卒于北京。

高尚德神父在正定府教团工作了 28 年,1723 年教难时被召回北京,由一位中国教士接替了他。可能就是那次他带走了一本圣经(第 1353 号),上面写着:“属于正定府,因教难转到北京。”

第七节 开封、上海、武昌、绛州

从这几个地方来的书不多。开封 5 册,其中 2 册属于骆保禄^①神父。他成功地与开封城里的犹太人打成一片,是第一个向西方提供了有关中国犹太人详情的人。上海 8 册,4 种是关于教义问答和神修的。武昌府 6 册,注明“武昌府住堂”。山西绛州 5 种 7 册。

按:最后我要提一下 39 种 75 册属于遣使会士的藏书,它们是错入了北堂书的。当年在分检旧书和新书时,由于缺乏其他证据,唯一能采用的标准是出版年代,即 1785 年,也就是遣使会士来华的时间。所有早于这个时间的书被归于南堂藏书。后来发现,虽然有些书是 1785 年以前出版的,但却是后来购买的,比如第 2139 号和第 3479 号书,是 1870 年由田嘉璧^②主教在罗马购得的。他当时在罗马列席梵蒂冈大公会议。但是这些书已经入册并已陈旧,将错就错,就不再动了。

第八章 移交俄国教团

这些书最后全部集中到了南堂。现在让我们追溯它们从南堂到俄国教团、再到老北堂的踪迹。

第一节 俄国教团

俄国人在北京有两处教产。较老的一处可追溯到 1685 年,一批俄国士兵在雅克萨之役中被俘,关押在北京东北角的一座塔里。一位俄国教士在今天“北馆”所在的空地上为他们建立了一座教堂,一开始叫圣·尼古拉教堂,后来改为“圣母安息”教堂^③。

第二处教产随公使萨拉·瓦拉迪斯拉维茨伯爵的到来而建立。根据 1721 年 11 月 1 日的条约,他被允许在公使馆旁边建立一座教堂和一座修道院。教堂至今还在俄国公使馆的大院里,名为“伊帕帕特”,即“奉献节教堂”,驻有一个教团,一名修士大司祭和两三名修士,一些牧师,以及五名学语言的非圣

①Jean-Paul Gozani(1659-1732),意大利人,又名陆恩德,1694 年来华,卒于澳门。

②Louis-Gabriel Delaplace(1820-1884),一名田类斯,法国人。1843 年成为遣使会神甫。1852 年被任命为中国江西代牧区宗座代牧。1854 年任浙江代牧区宗座代牧,驻扎宁波。1870 年调任直隶北境代牧区宗座代牧,驻扎北京。

③东正教在北京设堂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雅克萨城自卫反击战中俘虏的沙俄入侵者押来北京的有 59 人,其中一名是司祭,康熙帝就将东直门内胡家园胡同的一座关帝庙拨给他们作临时祈祷所,这就是北京人所称的“罗刹庙”或俄罗斯“北馆”。

职人员^①。

东正教团有了自己的翻译,不必烦劳清廷的耶稣会士就能直接与彼得堡联系了。直到1860年,俄国教团还保留着这种外交功能。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教难期间它一直平安无事,因而能够帮助毕学源主教的教团。

俄国教团每十年更换一次人员,到南堂结束时共经历了九次。第十届教团于1820年12月1日抵达,修士大司祭是彼得·卡缅斯基^②,他的助手是魏若明^③神父,还有四名修士和四位见习翻译。

五个月后魏若明神父来北馆学习汉语。他在中国人中间以才艺超群而广受欢迎,使他成为卡缅斯基的接班人。1830年11月,圣议会任命他为第十一届教团修士大司祭。1840年他返回俄国。我们的藏书得以幸存,要归功于这两位修士大司祭的好意,特别是这后一位。

第二节 藏书移交

我无法查到这批藏书移交给圣母安息教堂的确切日期。极有可能是秘密地分批移交的,因为清廷一直对南堂的财产虎视眈眈。病魔缠身、奄奄一息的老主教于1830年7月6日立下遗嘱,请求魏若明神父照料自己的丧事,守护栅栏墓地,作必要的修葺,卖掉主教的全部遗物,把所余款项送往葡萄牙,交给合法的主人。

没有一个字提到藏书,这使我们相信,它已经被安排好了。好几册书上有俄文的题识,但是我对这种语言一无所知,因而无法加入目录。这些题识有彼得大司祭的签名,时间是1828年4月和5月。由此可知,藏书在此之前已经被移交了。有在俄国教堂寄存过痕迹的总共是170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修道院教学藏书,均有一个编号,而且笔迹一致,从1到155号。它们全是拉丁和希腊经典,如演说家、现代和古代诗人、语法和词典、诗韵学、修辞学、神话学、戏剧等等。关于科学、宗教和历史的则一本也没有。我猜这些书是挑选出来供那些见习译员使用的。第二类似乎是为教士服务的,没有编号。在这一类里我们发现的是圣经和关于教理、伦理和神修、圣母、耶稣会的书,以及三册关于俄国的书。这部分书有题识和批注;一些有彼得大司祭的签名,另外的没有。

第三节 赠礼或赔偿

有人说南堂藏书是作为礼物送给俄国教团的。我在现有的文件里未找到支持该观点的任何材料。如果是赠礼,为什么他们又把这些书归还了呢?总共5000册呢!毕学源主教所做的把教堂财产送回给葡萄牙主人的安排,表明他绝

①雍正五年(1727),中俄两国签订《恰克图条约》。根据该条约第五款的规定,俄罗斯东正教会可以定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和学习汉语的学生,准许在北京建立新教堂。新教堂地址定在东江米巷(即后来的东交民巷)。1732年正式落成,也叫俄罗斯南馆。

②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менский(1765-1845),俄国科学院院士,满学家。

③Fr.Benjamin,俄文名维尼阿明·莫拉契维奇。

非那种“擅自作主”安置这批藏书的人。再说代理主教赵若望^①神父和教士们也会提出异议的。我倒是找到一个相反的佐证。有一天凑巧有一位俄国人来访,我请他为我翻译彼得·卡缅斯基写在韦里塞利的《论使徒传教》一书上的一段题识,大意是:“欧洲藏书中有两本这种书,我就自作主张把一本放到俄国藏书里了,因为这本书讨论的问题是所有传教士都关心的。签名:大司祭和骑士彼得,1828年4月27日。”注意,一是这里有两份藏书;二是仅仅移动一个复本就如此谨慎,在书上加注,并签上名字和日期,显然是以防效尤。书的主人不会这么做的,代管的人才不会。而我们的代管人又是多么忠实啊!

还有一种说法,指这批藏书是毕学源主教抵偿了所欠魏若明大司祭的债,其根据是一份官方文件。不错,是有一份钦天监呈道光皇帝的奏折,登在1839年1月的官方公报上,与主教的葬礼时隔不久。它说主教积病多年,债务累累,现请魏若明大喇嘛(大司祭)操办后事,一应款项皆以变卖的教堂财产抵偿。

但是我们还有一封大司祭的信,和一封代理主教赵若望神父的信,可以证明此说纯属虚构。赵若望神父未能赶进城来参加葬礼,所以仁慈的大司祭才独自受命。他写信给赵若望神父:“朝廷大吏索要教堂和房产,无意移交给我们。需要反复而漫长的讨论,才能使他们承认我们应得的权利。”

就是在这样的讨论期间,他的代理人想出了以教堂财产抵债的计策。大司祭对此计的结果十分满意:“教堂的全部房产和墓地已都交还了。现在我们可以卖掉房产,保留墓地了……在变卖完一切可以折现的财产之后,我将非常高兴,也理所当然,交还给阁下或您指定之人一切剩馀。至于我手中现有的钱和物品,我给你一份中文的清单。”由此可见,事情十分明白,大司祭所图并非私利,代理人的计策也确实有效。

第四节 藏书复归

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的1860年10月13日之前,帝国的摄政王恭亲王曾邀请孟振生主教做他和联军之间的调停人。可是这位主教正躲在乡下,未能及时露面。当他10月23日入京时,谈判已经结束。额尔金^②伯爵于24日签署了条约,第二天葛罗^③也签了。条约要求归还所有老教堂、老房产和老墓地。俄国

①Joao De França Castro E Moura, 葡萄牙人,1830年来京助理,1831年被委为江南代理,1838年闭学源逝世,南堂关闭,赵若望为署理,至1846年回国为止。

②Lord Elgin(1811-1863),英国贵族,1857年7月任英国对华全权专使,并率领一支陆海军赴华。12月,与葛罗所率法军在香港集结。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次年春,北上天津。5月,攻陷大沽炮台。6月,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1859年回国。不久,重任英国对华全权专使,同葛罗复率英法联军来华。次年8月,又陷大沽炮台,攻占天津。10月,进北京,焚毁圆明园。按英国外交部训令,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让“粤东九龙司”一地。1861年南下香港,依约划割九龙。1862年调任印度总督,次年,卒于任上。

③Jean Baptiste Louis Gros(1793-1870),或译作葛历劳士,法国外交官。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两度被任命为法国侵华军全权代表。1862年(同治元年)调任驻英大使,次年辞职。

首任驻华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将军还根据戈萨克夫亲王的指示,把由俄国教团保管的物产交还给葛罗。这当中无疑也包括藏书。有人说藏书是由鲍乃迪^①修士大司祭交还的。这种说法的来由可能是因为鲍乃迪协助副司令普提雅廷^②伯爵谈判了1858年天津条约的缘故。但是在1860年,他已经被固里^③修士大司祭接替了,后者是1858年9月29日率领第十四届教团抵达北京的。由于有了俄国公使,大司祭不再具有从前的外交官地位,只是一个宗教人士,而且不久就住到北馆去了。所以这批托管物应是由将军而不是由大司祭归还的。

由于南堂荡然无存,孟振生主教入住北堂。北堂虽然也残破,但至少还竖立着。那位1827年买下这块地皮的于姓官员用教堂的材料建了一座新房子。这批藏书就被安置在那里。

第五节 狄仁吉^④神父的目录

两年以后,和孟振生主教一起来北堂的狄仁吉神父开始给书籍分类和编目,更确切地说,是登记每一本书的书名、册数、尺寸、著者、编者、出版地、日期和其他特征。

目录首篇是五页拉丁文的序言,扼要回顾了这批藏书的历史。根据狄仁吉神父的说法,移交给俄国教团的时间是毕学源主教死后的1839年,有天主教士参与其事。在介绍了北堂书埋入正福寺地下的情况后,他说:“南堂藏书逃脱了厄运。俄国大司祭前来帮助天主教士,并答应为他们保管这些书,直到形势好转再物归原主。天主教士接受了他的好意。从那以后直到1860年,他和他的同事妥善地保管了这些书。”

我已经说过我断定移交是在1828年的原因了。也许当时只是出借或部分移交?不管怎么说,它既非赠礼亦非抵债是确凿无疑的。

序言之后是20类书的主题和册数表。他统计出共有5400册书归还了。“遣使会士从1860到1862年间增添了大约500册,总数(不包括中文书和一些短篇杂撰)为5929册(实际是5930册)。因为藏书还会增加,我们在此确立以1862年10月20日为新旧藏书之分界,这是必要和合适的。”

狄仁吉神父最后说明了他为编制这份目录而制定的一些规则。他也注意到,由于聚散多变,许多书已经残缺破损了。

我复制了他的主题和册数表,因为据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批藏书的构成

①即第十三届传道团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法号鲍乃迪。

②Vasilevich Putiatin (1803-1884),俄国海军上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全权代表。

③Archimandrite Guri Karpov 是第十二届传道团的司祭,1858年受委任成为第十四届传道团的大司祭。

④Jean-Baptiste-Raphaël Thierry (1823-1880),法国遣使会士。所编目录 *Catalogus Bibliothecae Domus Pe-tang Congregationis Missionis Pekini Sinarum* 1861(《北堂耶稣教遣使会1861年图书目录》),见《华裔学志》4(1939-1940),第605-615页。

和相对的重要性。为了便于比较,我也列出了本文讨论的、包括他们的书在内的几批藏书的情况。

狄仁吉神父目录		北堂书	
1.圣经	205	1.南堂:保罗五世赠书	457
2.教父学	123	南堂:圣·洛朗藏书	29
3.a.神学:教义及伦理	537	南堂:中国教区书	143
b.神学:辩论及奥义	204	南堂:后来所得书	738
4.教规法及民法	305	2.东堂	13
5.证道及教理讲授	300	3.北堂	290
6.历史	531	4.西堂	102
7.圣仪	173	5.嘉乐主教	69
8.神修	700	6.索智能主教	115
9.哲学	265	7.汤士选主教	512
10.几何及水文学	96	8.济南住堂	82
11.文学	178	9.镇江住堂	42
12.数学	378	10.杭州住堂	35
13.天文及日晷测时学	438	11.淮安住堂	43
14.物理及化学	178	12.南京住堂	57
15.机械及工艺学	131	13.正定住堂	16
16.自然史	148	14.开封住堂	6
17.医药学	308	15.上海住堂	8
18.语言学	120	16.武昌住堂	6
19.传记	196	17.绛州住堂	7
20.杂类	316	18.遣使住堂	75
总数	5929	共	2885
	(实为 5930)	来历不明的书	2278
		总计	5133

从中减去遣使会士的 75 册书,我们从俄国教团手里收回的书只有 5058 册,比狄仁杰神父统计的 5400 册少了 342 册。根据他提供的目录,我们做出了一份失书单,发现主要是神学、决疑、神修、圣仪和教理讲授等方面的小册子。简而言之,是实用的传教资料书。这些书里大约有 100 册属于复本,另外的是藏书中有其他作者的类似的,所以损失不大。而且它们也不一定是永久地丢失了。比如,天津和镇江府的传教士听说我们在整理北堂书后,就送还了有

我们图书馆印章的旧书。这也促使我产生过到各个住堂进行一次访书之旅的念头。但是十年来我一直未能离开京城,而现在为时已晚,大部分住堂都已被洗劫一空了。

第六节 最后阶段

这批藏书此后在老北堂安居了一段时间。狄仁杰神父在他的序言里加的一条注告诉我们,1851年发生过一起火灾,烧掉了大部分建筑,图书馆幸免于难,只是所有的老档案都化为灰烬了。

1887年,北堂迁移到西什库现址。这批藏书被安置在院内西北角的一间屋子里。这一安排使其在1900年义和团的围攻中又逃过一劫。因为被靠近的皇城城墙挡着,避免了直接的攻打。朝西的窗户都被堵上了,沿城墙又挖了一条深壕,以确保没有地道通进来埋雷。所以三个月的围攻过后,它几乎毫发无损。它同样躲过了最近的日本对华战争的危害。这么说也不完全准确。1943年3月6日夜里,附近的房子失火。有一位日本卫兵进来,开始只是维持秩序。后来负责的指挥官看到我们全都在竭尽全力抢救这批藏书,似乎仍然力所未及,便打电话叫来一连士兵。他们用了三十分钟时间,勉强出清了全部藏书,此时消防队才刚刚控制住火势。几天之后,敌对国的公民都被遣送到潍县集中营,我这个正在编这份书目的图书馆员却被豁免了,因为这份书目将会是有益于全人类的。

结语

这份简史已远远超出了一份书目序言的篇幅,所以我不得不略去对欧洲来的摇篮本、手抄本、中国的雕版、日本和菲律宾的初版本,以及书目学家视如珍宝的其他善本书的介绍了。请读者自己在书目中搜寻,享受发现的快乐吧!我自己就在其中发现过直到阅读书目才知道的宝贝,如第952、1246、2644、3673号等书。这些书本身的价值已无庸赘言,其真正的价值来自于它们所服务的人,那些伟大的先辈。有关天主教在中国的最初200年,它们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文献。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来说,这份藏书是一场东西方两种伟大文明和平相会的媒介。这场相会不像唐朝的和元朝的那样短暂。尽管历经坎坷,双方都获益无穷的永久性联系毕竟由此而建立起来了。

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一直对首都将被围困而忧心忡忡。围困终于在12月15日开始了,但图书馆至今为止尚安然无恙,而和平谈判也开始了。但愿战祸再次宽宥神父们留下的这份神圣遗产吧!

惠泽霖 传教士 图书馆长
1949年1月21日于北京

译注者单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